

李庆信 著

沙汀小说艺术探微

SHATING
XIAOSHUO
YISHU
TANWEI

.42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81 沙汀小说艺术探微
SHATING XIAOSHUO YISHU TANWEI
李庆信 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05千
1987年11月第1版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7-80524-057-4/Z·4

(书号: 10316·16) 定价: 1.90元

序

荒 煤

读完了李庆信同志的《沙汀小说艺术探微》，我感到很高兴，也为沙汀同志感到高兴。沙汀同志从30年代初期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是我国左翼文艺运动以来至今还未搁笔的一位著名作家，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方面，都写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正如本书首篇的标题所说的，沙汀同志毕生的创作生涯，的确是“紧跟时代，不断探求”的一生。可惜，对这样一位获得巨大、宝贵成就的老作家，随着时代的进展和转换，是怎样战斗过来的，他在各个不同的革命时期进行过哪些探索，有哪些突破和新的成就，在形式、风格、艺术技巧方面有什么独到之处，都还缺乏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和评价。

前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中虽然出版了一本《沙汀研究专集》，也仍然缺少这方面的著作。尽管庆信同志自谦，认为这本著作的有些篇章，只不过是读书心得，然而，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对沙汀小说艺术作了综合论述，也进一步概括了沙汀一生创作的道路。这不仅对爱好和研究沙汀作品的同志提供了重要的论著，也为研究现代文学、左翼作家联盟历史提供了资料；当然，对沙汀这位老作家也是一种应有的安慰。

作家，一般地来讲，主要是通过作品来表述自己，表现自己对

生活、对社会、对时代的认识和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生动鲜明的形象——作家倾注自己全部的心血，对每个人物充满了爱憎、同情、关怀——藉以抒发自己的激情，去展示生活的真实和矛盾，探索生活的真理。尽管有些作家也写点自传性质的文章，谈创作经验和感想、甚至创作的经历，但是很少有作家能够完全摆脱“自我”，冷峻地严格地解剖自己，去给自己作出全面的总结来。这不是作家的任务。作家也是人，也未必都能无情地解剖自己；作家又是时代的产儿，因此，作家所反映的生活，也不可能没有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我认为，当作家把自己的创作全部献给读者之后，实际上也把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对生活 and 时代的感受，对真理的追求和向往，一句话，把自己整个心灵都已经献给了广大人民了。至于他的贡献大小，历史的地位，是非功过，如何评价，这应该是文学评论研究工作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很遗憾，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干扰，文学评论经常“以阶级斗争为纲”，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一部作品不进行分析，或捧为“样板”，或贬为“毒草”，动辄搞“大批判”，追究创作动机与思想，或归结为一个反动的普遍的创作倾向，或成为一个系统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于是，对作家某一部作品评头论脚较多，就作家全部创作进行具体对比、分析、研究不足，对作家的整个创作成就和个别失误或错误尤其缺乏具体分析。总之，对作家的研究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既不可能对作家个人、也不可能对这一段历史时期文学现状和成就作出科学的判断和评价，也就无法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去推动新文学运动继续前进。

近几年来，新时期的文学评论研究工作有了可喜的发展和成就，作家传记、作家评传、作家创作道路、作家群、作家流派的研究等等著作的发表和出版就是证明。一批能够独立思考，勇于探

索的中青年文学评论研究工作者的确在这方面开拓了新的领域。就以这本著作来说，其中许多重要的篇章，也都是庆信同志近几年写的，而且敢于提出新的见解。

例如，作者对沙汀的创作道路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肯定是“紧跟时代，不断探求”的过程，但是，在充分肯定沙汀解放后的创作仍旧取得不少成就之后，最终，作者经过分析，还是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来自国统区的老作家，他们创作的优势还是在写旧时代的生活”。

作者从文学与政治、创作与生活、作家与时代几个方面作了些扼要的分析。可是，真正要回答这个问题，的确涉及到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值得我们大家思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究竟怎样去发挥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生活领域的作家的优势，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留下更加丰富多采、光辉灿烂、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作品？

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复杂而且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我认为，必须发挥每个作家各自不同的优势——这种优势，就是表现为：作家在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领域中所有的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对人物的命运的真切关怀和深刻理解，而且在运用语言和技巧去表现生活、时代、环境以及人物心理状态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只有这种优势，才能使得我们文坛真正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作家们才可以说有了真正的创作自由。

沙汀同志的绝大部分小说，都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冷峻的讽刺手腕，反映国统区农村社会的黑暗现实，既给予苦难人民以真挚的同情和热爱，也无情地暴露了农村基层官吏、袍哥大爷、地主豪绅等各种统治阶级的人物，从而批判了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各种政策、法制等等一切反动措施。这些作品中创造了许多真实鲜明的形象，人物个性的生动，作品语言的精炼，以至题材选择角度的新颖和开掘的深度，对旧社会罪恶暴露的尖锐，思想的深

刻，都显示了沙汀创作上的突出成就和独到之处。沙汀同志从创作开始，就受到鲁迅宝贵的启迪：“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他始终严格遵循这个教导，走自己的路，开拓自己独特的领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终于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中独树一帜，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庆信同志的这本书重点是研究沙汀解放前的小说创作，在这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精辟和公允的论述。同时又认真地把沙汀同志解放后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分析，也充分肯定了《木鱼山》是解放后“思想高度和现实主义深度上”“最有份量的力作”，然而，最终，还不免发生感慨：沙汀以及其他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他们的小说的创作的优势还是在写旧时代的生活。

作出这个推论是有勇气的，但也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论断。可惜作者在这方面没有把这个思想更进一步加以充分的发挥、阐述。

我认为，这个问题对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记得，30年代曾经在中国文学论坛上有人提过这样的论题：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托尔斯泰、高尔基？建国之后似乎也有人提过：我们为什么不能再产生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苏联在建国之后也似乎提过需要再出现托尔斯泰、高尔基这样的作家……。

如果这只是出自如下一种善良的愿望和期望，即：在一个新时代到来之后，希望和旧时代一样，同样可以产生能够非常敏锐、深刻、细腻地去反映当代人民生活，创造丰富多采的各种典型，并对时代有深刻理解和较高艺术概括的作家，这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这绝不是说，许多从旧社会、旧时代走过来的，有其

极为丰富、复杂的经历，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无数鲜明的形象记忆的老作家，应该放弃自己这个优势，把自己长期积累的最熟悉的生活和形象统统抛弃，割断自己和历史的联系。当作家正在成熟的时期，割断历史重新去熟悉陌生的事物，只会导致创作的萎缩、浮浅，以至搁笔，从而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一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老作家，到了新社会，不再受到反动统治下检查制度的束缚，有了更广阔的自由，既可以更广泛搜集材料，把旧时代同新时代加以比较，又可以更充分运用新的观点，站在新的思想高度，更深入、更全面地去反映昨天的生活，概括过去的历史。因而，正是他们才有这种可能给我们创造更丰富、更复杂、更深刻反映旧时代广阔世界“百科全书”式的史诗，或是描绘新旧时代交替、伟大历史转折的生动全貌的巨著。因为，他们特殊的阅历、修养、才能，以及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熟，形成了他人不可代替的优势。

设想沙汀同志能够在解放后早日解脱一些行政组织工作，也不忙于去赶任务，反映种种运动，而着力于写旧时代的崩溃，把过去由于在白色恐怖下还不够深入熟悉或不能表现的东西再加以补充，把四川偏僻农村在全国解放前夕各种情景和国民党所谓大后方的混乱，上下左右交织起来写，难道这不是一部中国农村翻天覆地伟大历史变化的史诗么？我想它的价值和意义不会下于《子夜》，甚至也不会下于《复活》。我最近读了沙汀的即将发表的中篇小说《红石滩》——描写四川深山边沿县城即将解放，地方封建势力、反动政府以及下层各种人物的行动和心理，——更加确信这一点。

也许我孤陋寡闻，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到过这样一部巨著。

也因此，我觉得文学理论中，时至今日，也需要很好的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再不要笼统、泛泛地去反对写“自己熟悉

的”这个简单朴素却是一语道破的创作规律了。

现在对文学的现象、本性、观念颇多议论、探讨、研究。但是属于文学的规律终究是不可改变的。文学是人学。熟悉人是第一位工作。反映生活和时代，表现时代的真实，也只能通过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各种人物现象；所谓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归根到底，无非是写自己熟悉的人。而人是最难熟悉的，往往是在作家童年记忆中就开始了“熟悉”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对作家和作品来讲，“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丢掉这个财富，就未免太愚蠢了，这个教训也太严重了。

当然，这也绝不是说，老作家不必要、不需要去了解新时代、新社会、新生活和新的人物。沙汀解放后在小说创作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优势，不等于说他不应当写《木鱼山》（何况，《木鱼山》也不失为优秀的作品），更不能否认他在小说之外，还写了报告文学《记贺龙》和反映八路军在敌后抗战的一些散文、日记。我觉得一个老作家进入新时代，当他还不能熟悉新的人物来创作有份量的小说的时候，采用报告文学、散文形式去热情地反映现实斗争，或从某些侧面去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这是无可非议的。《记贺龙》至今读来，我们还不能不为这位将军鲜明的个性所感染，感到亲切可敬。这部分作品同样也是沙汀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这本著作指出沙汀同志小说创作的优势，作为对一位具体作家的研究，作为学术问题来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不过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来看，却又不是一个作家个人的认识和责任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一种违反艺术客观规律、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种情况不改变，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不利于有不同经历、修养、风格的作家各尽所能，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促使创作更加繁荣昌盛，更加丰富多采地反映我国的历史和现实，从而产生更优秀的伟大

的作家和作品。

在今天四化建设和改革潮流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一个新的文学繁荣时期已经到来了，让老中青几代作家都能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去开拓自己的新领域，走自己的道路，发挥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独特的风格。我想，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我认为，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赵树理、巴金、曹禺以及沙汀等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只能有一个。因为只有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才能产生他们。而只有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人物最熟悉，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充满激情去表现，并形成自己最独特的风格。所以，优秀的作家只能是时代的产儿，只能是这个时代的“这一个”唯一的宠儿，甚至是一个时代的“天之骄子”。

也正因为只能有一个，他的创作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特有的光彩，才成了我们珍贵的精神财富，才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后千万要注意爱护每一个作家的优势，发挥每一个作家的优势。

让作家们多拥有一些自己的优势，让我们的时代多一些“天之骄子”，让我们文学史上多几个响亮的名字，多几部瑰丽雄伟的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优秀著作，多给我们人民留下一些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多好！

我很高兴从庆信同志这本书里得到这一点启示，发表这么一点杂感；既是表示我的祝贺，也表示我对中国文坛的未来的光辉前景充满了真挚的期望！

1986年6月8日晨

目 录

序.....	荒 煤
紧跟时代 不断探索	(1)
——沙汀的生活与创作道路	——
论沙汀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	(30)
沙汀笔下的川西北乡镇风情	(49)
活生生的中国农村末代封建阶级群丑图	(67)
——论沙汀小说的反面形象系列	
严峻苦涩的笑	(81)
——论沙汀小说的讽刺艺术	
时代的悲歌 沉郁的诗情	(96)
——论沙汀早期的悲剧型小说	
精巧·严谨·别致	(111)
——沙汀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	
沙汀小说的叙述方式	(128)
沙汀小说的细节描写	(142)
沙汀小说的语言艺术	(157)

论《淘金记》的独创性·····	(177)
“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196)
——《淘金记》批评辨析,兼论“暴露文学”	
苦闷的挣扎·····	(215)
——《困兽记》散论	
跨出新的一步·····	(232)
——重评《还乡记》	
性格的碰撞 心灵的历程·····	(244)
——重读《闯关》	
 试论沙汀解放后的小说创作·····	(255)
回归中的超越·····	(273)
——喜读沙汀新作《红石滩》	
 后记·····	(280)

紧跟时代 不断探索

——沙汀的生活与创作道路

1931年，在上海亭子间，有两个来自四川的文学青年，曾就创作题材问题，联名写信向一代文学宗师鲁迅先生求教。在鲁迅回信的启示和鼓舞下，他们消除了迟疑和犹豫，勇敢地在文学道路上迈出了有力的第一步，很快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和重视，成为左翼文坛“双璧”。

这两个青年，一个就是沙汀，另一个则是他的同窗好友艾芜。

时光如逝，岁月如流。弹指之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社会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动。当年的文学新人沙汀，而今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但他还在新时期的文学园地上，孜孜不倦地辛勤笔耕。

沙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建树的一位重要作家，也是一位创作历程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的“跨代”作家。他的一生，是紧跟时代、不断探索的一生。从封建阶级的飘零子弟，到革命的战士、作家，从旧时代到新时代，他走过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他担过风险，吃过苦头，有过挫折和苦闷，但他始终未改初衷，决不半途而废，总是努力紧跟时代，不断探索，一步一个脚印地朝既定的目标走去。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和为

人，我们现在不妨沿着他走过的脚印，略约回顾一下他的生活与创作历程。

作家的“根”就在这里

一个作家的孕育、成长，既离不开大的时代环境和社会历史、民族文化背景，更与他自幼生于斯、长于斯的特殊生活环境密切相关；而后者正是他的“根”所在，对他一生的道路和事业往往有深远影响。

沙汀的“根”，就在四川西北部一个闭塞的山区小县——安县。这个县，距省会成都三百余里，与绵阳、北川、茂县、绵竹毗邻，境内绵亘着岷山余脉，湍急的北川河蜿蜒其间，县城依山傍水，街道古老狭窄，过去只有居民千户左右。

1904年农历冬月十三日，沙汀就出生在安县城关西街的一座院子里。

沙汀原名杨朝熙，后改名杨子青。1932年10月出版第一个短篇集《法律外的航线》时署名沙汀，以后便一直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个别作品曾用过尹光的笔名）。

祖父杨仁和作过清朝小吏。父亲杨义质是前清廪生，1909年病逝，留下五十亩土地，一座院子。母亲郑妙贞是位能干贤淑的家庭妇女，丈夫死后，家道中衰，便卖去房产，开了座水碾，独立撑持家计，抚养沙汀兄弟二人。后因舅父郑慕周在辛亥革命期间参加了当时反清的哥老会组织，在安县有了点地位，沙汀的家境才随之有所改善。郑慕周后来进入军界，在地方军阀部队任过旅长，长期驻防灌县、茂汶、郫县等地，1926年回归安县故里；解放后任安县副县长，1955年病故。郑慕周尽管是个没啥文化的大老粗，但为人正直，热心桑梓，思想也比较开明，对沙汀影响很

深，日后为掩护沙汀，为发展安县文化教育事业作过不少有益的事。

沙汀从七岁以后，母亲和舅父曾多次延聘塾师来家任教，使他接受了旧式的启蒙教育，打下了一定的旧学功底。

对沙汀未来文学事业影响极深的是他十二岁以后有几年十分特殊的生活经历。舅父郑慕周为了替提拔过他的袍哥首领李丰庭报仇，枪杀了本地一个自称独立司令的土匪头子陈红荪，为防报复，便不敢在县城露面，拖起十几条枪辗转游荡于各乡镇。于是，沙汀也跟随舅父“到处跑码头”，还学会了骑马，经常单独为舅父传递消息，运送枪枝。几年“跑码头”的生活，虽然使沙汀中断了学业，却使他因此广泛接触了农村社会，特别熟悉了四川场镇的风土人情和统治阶层的各色人物，这为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扎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储存了大量生动的原始素材。

沙汀在故乡渡过了他的少年时代。闭塞落后的安县，当时几乎与世隔绝，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这里也未引起一点反响，甚至鲜为人知。沙汀知道五四运动，那也是在1922年去成都读书以后的事。

补上了时代新思潮的一课

1922年春，已任地方军阀部队混成旅长的郑慕周，通过私人关系把沙汀送进了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从此，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青年，思想上才逐步从闭塞的小天地跨进了大时代的门槛，补上了时代新思潮的重要一课。

在省师第一年，沙汀也只钻国文，特别喜欢归有光《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文章的清淡朴素。但，在与同学交往中，他逐渐接触了新思潮和新文学。

省师求学期间，对沙汀影响较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校工出身的同班同学张君培。此人喜欢社会科学，经常向刘愿庵、王右木（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借阅这方面书刊，沙汀又从他那里借来看。沙汀从张君培的口中，才第一次知道了五四运动，通过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学灯》、《觉悟》等杂志，接触了当时种种思潮，使他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两人结合阅读书刊，还经常一起讨论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和社会制度问题。张君培，可以说是沙汀新思想的第一个启蒙者和“播种者”。二十多年之后，沙汀还怀着对张的感念之情写了《播种者》一文。另一个在文学上对沙汀影响较大的，是同班同学汤道耕（即艾芜）。汤当时对新文学有浓厚兴趣，还喜欢写诗。同汤交往后，沙汀开始接触新文学，读康白情的《草儿集》，胡适的《尝试集》等；而真正引起他对文学浓厚兴趣的，是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故乡》。这以后，凡是有鲁迅、郭沫若作品的书刊，他和汤道耕都买来看。两人经常出入于成都商业场“华阳书报流通处”，从那里购买、阅读了许多新文学书刊，象《创造月刊》、《创造周报》、《未名》、《莽原》以及后来的《语丝》。此外，沙汀还读了不少翻译文学作品，显克维支《你往何处去》所写的那种殉道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鲁迅编译的《域外小说集》，令他耳目一新；芥川龙之介的《鼻子》、《罗生门》，他也读得津津有味。

大革命开始以后，沙汀又结识了比他低两班的同学周尚明（后成为共产党员）。在周的影响下，他的思想有了新的进步，除经常阅读《中国青年》、《向导》等杂志外，还系统研读了上海大学（共产党办的）的社会科学讲义，郭沫若翻译的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恽代英翻译的《共产主义ABC》，以及其他翻译的博洛德的《〈资本论〉浅说》等书籍。

省师的几年求学生活，是沙汀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起点。

这段时期，他不仅完成了思想启蒙，培养了文学兴趣，也为他以后加入共产党组织，投身革命激流打下了基础。

投 身 革 命 激 流

1926年秋，沙汀在省师毕业后，应同乡向履丰之约，到南京去报考东南大学。及到南京，一看该校讲义，内容太陈腐了，就改变主意，转赴北京，与先已去京的舅父郑慕周住在一起。他原想报考北京大学，因考期已过，他素所景仰的鲁迅先生又已离京南下，于是便接受了当时在京的几个省师同学的建议，不再考大学，准备走自学的路，同时有选择地到大学旁听一些课程。10月初，因舅父钱花光了，不能继续留京，只好变卖东西，筹集路费，去武汉取水路，经三峡回川。

当时，大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北伐军已占领武汉，四川军阀也先后纷纷改换旗帜。沙汀回到安县，安静不下来，经常到成都去，找同学摆谈时局。1927年初，经周尚明介绍，沙汀在成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周又介绍沙汀去见川西特委负责人之一的刘愿庵——刘当时是以国民党川西特派员身份公开活动的。在沙汀汇报了安县社会政治情况以后，刘就委派他回安县成立左派国民党县党部，同时，发展共产党员，筹建党支部。回到安县，由本地耆宿推举，经党组织同意，沙汀又担任过县教育局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四川形势也急转直下，国民党当局在“清党”的名义下另派人接管了安县党部筹备处，于是，沙汀便把精力放在筹建共产党支部上。

1928年2月，沙汀去成都向上级请示发展党员的问题，正碰上“二·一六”惨案发生。在惨案中，遇难的有周尚明、袁诗尧等十四位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沙汀到成都未找到接头人，

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这对入党不久的沙汀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为此感到很苦闷，但他不是在苦闷中沉沦，以至转向，而是在苦闷中继续探求真理，探求知识，探求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思考，他决心去叩文学大门了。

初 叩 文 学 大 门

1927年至1928年间，沙汀受舅父郑慕周的委托（郑于1926年辞去军职，回到安县），在安县创办了私立汶江小学和县图书馆，对发展安县的教育文化事业作了有益的贡献。

1929年春，沙汀因涉嫌所谓“教匪”攻城事件，闹得满城风雨，不能在安县立足，于是乘船经三峡去上海。那时，土地革命的风暴正席卷全国，沿江两岸也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岸上高架着的标语牌，耀眼的红旗，头缠红布、吼叫着、攒动着的人群，这一切都给沙汀留下了深刻印象。凭着这些印象，他在三年以后写了短篇《法律外的航线》。

一个内地青年，初来乍到十里洋场的上海，举目无亲，四顾茫然。沙汀报考大学的愿望又一次落空，后来见到在招商中学教书的四川老乡杨伯凯、任白戈，于是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住进亭子间自修社会科学和文学，兼学日文。

在上海前一两年间，沙汀因失去组织关系，又夹杂着恋爱问题、出路问题，苦闷得很，整天把自己关在闸北一间破后楼里，即便是热天也不肯轻易出门一步。读书，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和精神上唯一慰藉。这段时间，他继续研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书籍，在与杨伯凯、任白戈等人筹办“辛垦书店”时，他曾一度跃跃欲试，想编一本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小册